

——|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

# 外来文化


## 摄取史论

[日]家永三郎 著 靳丛林 陈泓 张福贵 刘珊 译



日本著名史学家 **家永三郎**  
探索日本文化转型的经典之作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 外来文化

## 摄取史论

[日]家永三郎……著

靳丛林 陈泓 张福贵 刘珊……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来文化摄取史论 / (日) 家永三郎著; 靳丛林等译.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47-9227-4

I. ①外… II. ①家… ②靳… III. ①文化史—研究—日本 IV. ①K313.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323 号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外来文化摄取史论**

WAILAI WENHUA SHEQU SHILUN

[日]家永三郎 著

靳丛林 等译

---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负晓娜  
责任校对 李婧慧 牛志远 裴红燕  
封面设计 王莉娟

---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 总序

李雪涛

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科的观念,同时也打破了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中国史纳入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签订各种合约确定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仅仅是一个海外的存在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标准的尺度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摒弃。作为全球史之父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 )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sup>①</sup>,因为特别

\* 此文系李雪涛为“全球史与中国”丛书所写的总序,此套丛书将由大象出版社(郑州)出版。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45页。

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和改变。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 1922—1968)甚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sup>①</sup>。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和空间的方式。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接触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米夏埃尔·盖耶(Michael Geyer, 1947— )和芝加哥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查理·布赖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sup>②</sup>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空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目前我们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上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中文世界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些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就。全球史与中国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意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他指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叉处,正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sup>③</sup>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他的自传中描述自己答辩的表现时写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

① 霍奇森:《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22~43页,此处见第43页。

② 盖耶、布赖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172~202页,此处见第186~197页。

③ Lucien Febvre, *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1953, p.30.

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端。”<sup>①</sup>在历史学和汉学的交界处、边缘进行研究,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其实也是费正清之所以能另辟蹊径,成就美国中国学的原因所在。而我们编辑的“全球史与中国”系列,特别需要这种在知识和方法论方面交叉拓展的刺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提出“总体史”(l'histoire totale),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认为一切的人、事件只有放到历史的总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旦将中国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的话,中国研究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就会显现。拿中国近代留学史来讲,只有将中国的留学研究放在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全世界的留学运动中,才能够突显出其价值和意义。章清曾撰文探寻以容闳(Yung Wing, 1828—1912)、严复(1854—1921)和胡适(1891—1962)为代表的三代留学生的思想轨迹,认为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去美国和英国留学,从而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其后又纷纷踏上了一条异常艰难的回归之路。<sup>②</sup>此外,留学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留学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学术的兴起,都曾起到过重要的意义。19世纪,美国就曾有过派出超过一万名留学生到德国洪堡大学留学的先例。<sup>③</sup>美国不仅借鉴了德国大学的模式,而且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融合英式学院于一体,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办学模式。日本和俄国也都曾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到德国的著名大学留学,回国之后的这批留学生的成就,也大大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大学体制乃至社会的发展。

① 费正清(J. K. Fairbank)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② 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22~160页。

③ Cf. John S. Brubacher and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1636—1976*.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 175.

## 二

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纲领,亦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sup>①</sup>在四大步骤中,“输入学理”便是要引进异域(当时主要指西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目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经过改造的中国文明,亦即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按照胡适当时的理解,输入学理的重要性,在于在认识和接受一些普世理论的同时,反省、更新自己的文化,为的是重新确定中国文化作为主体身份的价值和位置。今天来看,“输入学理”的深层含义还在于认同和接受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胡适并不认为这种认同意味着为西方所同化,而是本土文化的“再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逐渐恢复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使之适应于世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胡适的纲领除起到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作用外,也为解决文化出路问题提供了中国的基本经验。

从根本上来讲,全球史所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史与中国”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的著作,这套丛书也包括世界与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之所以有这些专题,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相关的,年鉴学派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刘新成列出了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表达的互动模式的八种形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

<sup>①</sup>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著《学问与人生》,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86~93页。

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sup>①</sup> 上述全球史与中国的专题都可以归纳到刘新成所列的互动模式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 1949—2012)就认为世界史(全球史)所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sup>②</sup>。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们坚持翻译著作和用汉语写作的论著并重的原则。梁启超(1873—1929)曾认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sup>③</sup>当时依然流行的病灶心理,认为可以用译书来拯救中国。比梁任公早近3个世纪的徐光启(1562—1633)早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sup>④</sup>的主张。徐光启的目的也是为了“超胜”。我们认为,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早成为世界的一分子,而从世界学术界汲取营养,与各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活动,永远也不会终结。在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今天,冷战时期诸如“谁取代谁,谁消灭谁”的用语,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翻译也成为我们的常规工作之一。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宏大叙事(宏观),将范围限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缺乏对实际发生事件的理论解释,进而将历史简单化、贫乏化。实际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介入可以很好地解决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新的学术方法的引入也会重视“过程—事件”的动态研究,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研究和全球视野的结合中来考察历史。我们收录在“全球史与中国”丛书中的研究专著,往往是运用上述方法论在不同专题性研究领

① 刘新成:《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见《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② 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③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898年,第52页。

④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163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



域的个案,力求给读者呈现出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此外,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事件史,历史学家必须在不同的时段中对错综复杂的事件作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分析。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往往是经济交流的附属品。因此,欧洲近代以来的贸易史,是裹挟着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等内容一并到了中国的。实际上,对全球史与中国各个研究方面的探讨,只有在对不同时空动态过程的具体考察中才能得到具体实现。同时基于全球史构建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也是双向的。尽管我们可能从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方面,并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但还没有到进行全程性、整体性研究的程度。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只有有待于后来学者的努力了。

### 三

尽管这套丛书名为“全球史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都只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的说明和阐发,很多著作是将中国的事件、学说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历史、思想等方面的普遍问题。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柯文(Paul Cohen, 1934—2007)的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1997)<sup>①</sup>,实际上,想要处理的是有关在历史研究中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这套丛书我们既强调翔实的史料,研究内容的拓展,也重视新的方法和学理的引进。在以往研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档案资料的运用和整理出版,特别是对藏在海外的史料、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是非常重要的。而理论方面,在方法论和视角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的。总之,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式,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观念,并努力挖掘出新的史料,是这套丛书的特点。正因为此,这套丛书才可能会在读者那里产生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

<sup>①</sup> 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014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我们就提出了要将研究院建成国际学者进行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在2011年新版学科目录中,首次将“历史学”下的“考古学”“中国史”,以及“世界史”并列为三个一级学科。也就是说在国内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因此,只有“全球史”才是欧美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国别史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编辑出版这样的一套丛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求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从而真正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

我们常常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意思是说学术是天下人所共享的财富,不应当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应当据为己有。这套丛书既有翻译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全球史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国内外在“全球史与中国”方面做出成就的学者,多多为我们提供优秀的研究成就,并不吝赐教。因为除了神,没有谁能够具有全能的视角。

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变通性的最终活力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和新的制度。但是当与外来者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由于受到关注而被迫彼此竞争时,同样也是这些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sup>①</sup>在接触和交流不再成为障碍的今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真正能够促成中外学术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互动。

---

<sup>①</sup>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10页,引文略有变动。

## 译者的话

社会变革的实质是文化形态的转化,文化是一种符号系统,它既具有传播性,又具有稳定性。文化的传播性决定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必然交流,从而使文化系统获得新的动力。而文化的稳定性又必然对外来文化进行自在的选择处理,以保持本土文化的特性。

通过对这部书的译介,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了日本近代文化转型的全部过程;其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使我们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取向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与日本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以满足广大人民更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的。而日本近代的文化转型则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以获取高额利润、瓜分世界市场、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目的的。虽说这在当时与被其取代的封建幕府制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性,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仍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几乎在日本文化变革的第一天便存在了。日本的经济近代化过程便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近代化的迅速完成是以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为动力的。这种军事工业的超前发展必然造成日本总体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就成为必然。所以明治政府在立足未稳时,便发动了侵华的甲午战争。“始于幕府末期的这一传统,贯穿于整个明治、大正、昭和时

代。日本科学技术总体的异常贫困和一部分的畸形发展,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而最后垄断资本的形成又使极少数的财阀与政权合流,形成“金钱政治”的格局,从而使日本政治屡屡陷于危机之中。

日本近代化的实质,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摄取过程,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这便是,外来文化的摄取一定要与本民族固有文化的长处相结合,要适合自己的国情。

不同的文化类型都形成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此,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适应性。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文化取向形成了从“脱亚入欧”“和洋折中”到“准美国化”的运行轨迹。

面对充满诱惑力的西方文化,明治政府最初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外国万能主义”的口号。不考虑实际国情,把文化摄取当作文化移植,倡导一种完全西洋化的“鹿鸣馆文化”。当时曾任过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甚至主张“改英语为国语”。这种“脱亚入欧”的文化取向很快引起国家经济与国民道德的混乱。于是政府不得不结合日本现存文化的实际,采取一种“和洋折中”的文化选择,形成外来文化“日本化”的特色。这种文化折中论不同于明治初年“明六社”所主张的那种“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简单界定,而是强调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一体性。而二战之后,日本在战败的屈辱与外力的压迫下,最后走上“准美国化”的道路。结果,虽说其社会发展迅速,但其文化的模仿性与政治的附庸性都十分明显。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难能可贵的成功经验。即“教育立国”之大计的制订与实施。

“教育立国”是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奉行的根本国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决策者们认为人才的培养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赖教育。因此,日本各届政府都极其重视对教育的改革。推行全民义务教育,提倡尊师爱生,尤其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当然,其德育的内涵具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和军国主义气息,但这种教育模式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

在日本百年来的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启示,也有许多失败的教

训。这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的。

由于国情与价值观的不同,此书中有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文化的摄取中还往往有“逾淮为枳”的现象。尽管如此,仍不妨从中去感受一些什么。而此书中翔实、丰富的资料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有关问题的背景材料,来加以分析利用。

1989年4月1日于吉林大学

## 前 言

一、本书的着重点是对思想史的考察；对外来文化摄取史实的探讨，专门让位于注释中引用的诸先学的成果，本书只限于概观其大纲。

二、本书中有些地方虽然涉及攘夷论、国粹主义等主张，但阐明这些思想的全貌不是本书的目的，有关这方面问题让位于以这些思想为主题的其他研究。

三、只说“西方”而未考虑其中英、德、法、美等国的区别，原因之一是很多地方（从问题的性质上看），不一定有必要加以区别。但多少应该涉及而又未能涉及的，却是因著者力疏，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本书的主要部分，因主题性质的限制，自然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是以幕府末期乃至明治初期的问题为中心。但目标所向，正如书名所示，是包括整个国史中的外来文化问题的，它不同于世上的所谓维新史或明治文化研究。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充分理解。

五、这样的目标虽然不一样，但在资料方面，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不与维新史和明治文化研究相通。可是，对于像著者这样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的人来说，彻底地搜集利用这方面众多的未公开或公开发行的珍贵文献资料是极为困难的。本书的资料之所以专以流传的文献为主，时时标明出处，而且也不排斥间接引用，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六、资料的搜集如前所述，但明治以后的资料如汗牛充栋，终不是我浅学之辈一朝一夕便能涉猎的。因此，我选取的主要材料，是以欧化主义及国粹主义为

核心思想的机关杂志中的文章,另外也参考了个别的单行本,并未参考其他报纸。

七、介绍过去的思想时,还是让过去的文献自我表现为好,但舍去与文章有微妙联系的思想的危险很大。从这种想法出发,著者在著作中不顾烦琐之嫌而多引用资料。这会导致本书的大部分都是引用的内容,我这么做是因为本书的资料之中确实含有不少在今天仍不失生命力的必读文字,愿读者能体察著者的立意所在。

八、资料的引用尽可能避免重复。前一章节引用的文献,即使是适用于后一章节的资料,也大多割爱了,所以请读者随时参照前后文。

九、引用文献的底本大多省略了,并未逐一标注。但是,原则上以下面丛书全集中收录的内容为主。若有重复的版本,则选择最合适的版本。主要涉及的书如下: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正续群书类从》《续续丛书类从》《五山文学全集》《日本名著全集》《日本随笔大成》《日本随笔全集》《日本经济丛书》《通俗经济文库》《日本伦理汇编》《日本书论大观》《文明源流丛书》《正续异国丛书》《海表丛书》《长崎丛书》《漂流奇异全集》《异国漂流奇谭集》《大日本古文书》《日本史籍协会丛书》《明治文化全集》《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岩波文库》《佛教大师全集》《弘法大师全集》《道元禅师全集》《日莲圣人全集》《山鹿苏行全集》《新井白石全集》《益轩全集》《慈云尊者全集》《本居宣长全集》《平田笃胤全集》《上田秋成全集》《橘守部全集》《田能村竹田全集》《梅园全集》《帆足万里全集》《前野兰化附录著译篇》《磐水存响》《磐溪先制》《峰山全集》《高野长英全集》《佐藤信渊家学全集》《象山全集》《松平春岳全集》《桥本景岳全集》《吉田东阳遗稿》《吉田松阴全集》《东行先生遗文》《大桥讷庵先生全集》《大国隆正全集》《横井小楠遗稿》《栗本锄云遗稿》《伊达自得翁全集》《海舟全集》《大西乡全集》《西周全集》《西周哲学著作集》《正续福泽全集》《敬宇先生文集》《鼎轩田口卯吉全集》《集山存稿》《羯南文录》《植村全集》《内村鑑三全集》《透谷全集》《冈仓天心全集(六艺社版本)》《二叶亭四迷全集》《欧外全集》《漱石全集》《荷风全集》。

十、本书开始准备执笔是在昭和十七年初,大体完成于昭和二十年三月。恰好与太平洋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同。随着战争的激化,阅览资料逐渐困难,加上著者患病及其他障碍,工作是极为艰难的。尽管准备不充分,但还是大致完成了。在执笔本书稿时,耳边不断听到室外传来的有如失去理智的愈来愈高涨的排外思想的风暴声,整本书,包括最后的引文,都寄寓着作者当时难以抑制的感情。然而今天时势一转,觉得当时因反感而加以抑制大有必要,这姑且不论,想到本书也有其意义,才敢于使之问世。读者若读本书,倘若怀疑著者过于恳挚地说出了心中的话,那也是因为想起本书是上述时期完成,由于上述一些情况才欲罢不忍的。所以请读者谅解。

昭和二十一年新春



## 目 录

译者的话	001
前 言	001
<b>绪 论 外来文化摄取史概说</b>	001
第一章 日本文化史的一个特征及其由来	003
第二章 古代中世及近世对东方文化的摄取	006
第一节 日本文化的渊源及其同中国大陆、南洋等文化的关系	006
第二节 对中国文化及佛教文化的摄取	008
第三节 摄取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的思想基础	019
第三章 近世对西方文化的摄取	050
第一节 近世初期对南蛮文化的摄取	050
第二节 摄取南蛮文化的思想基础	054
第三节 锁国后迄今对欧美文化的摄取	070
附 日本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	074
<b>本 论 锁国后至现代摄取欧美文化的思想基础</b>	077
第一章 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反应	079